



【人文与社会科学文丛】

幸福经济学选读

——欧美（前400~1900）分册

XINGFU JINGJIXUE XUANDU

傅红春 蒲德祥 编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人文与社会科学文丛】

幸福经济学选读

——欧美（前400~1900）分册

XINGFU JINGJIXUE XUANDU

傅红春 蒲德祥 编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经济学选读：欧美（前 400 ~ 1900）分册 / 傅红春，蒲德祥编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4
ISBN 978 - 7 - 5130 - 2622 - 2

I. ①幸… II. ①傅…②蒲… III. ①经济学 - 著作 - 介绍 - 欧洲 - 前 400 ~ 1900②经济学 - 著作 - 介绍 - 美洲 - 前 400 ~ 1900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5003 号

内容提要

经济学对“幸福”，离弃还是回归？如何解开斯密的“价值之谜”？如何解开《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所呈现的“两个斯密”之谜？理性还是感性？做“经济人”还是“道德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为何，“幸福”去哪了？溯自世界公认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古希腊时期色诺芬的《经济论》，延至 1900 年，欧美两千余年历史中，魁奈、休谟、斯密、边沁、马尔萨斯、李嘉图、马歇尔等 36 位世界大师级经济学家 40 部传世巨著的 1300 多万字中，论及“幸福”的章节字句达数十万字。本书通过对精选著作的品读、咀嚼，为今天的读者在财富增长和生活方式不断变化所带来的或愉悦享乐或迷惑困苦里，提供思想线索和精神营养。

责任编辑：祝元志
封面设计：刘伟

责任校对：董志英
责任出版：谷洋

幸福经济学选读：欧美（前 400 ~ 1900）分册

傅红春 蒲德祥 编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责编电话：010 - 82000860 转 8513

发行电话：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印刷：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960mm 1/16

版次：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字数：504 千字

ISBN 978 - 7 - 5130 - 2622 - 2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编：100088

责编邮箱：13381270293@163.com

发行传真：010 - 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经 销：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印 张：28.25

印 次：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代 序^①

经济学对“幸福”的离弃与回归 ——“斯密之谜”的一种解释

英国学者斯密（1723~1790）给后人留下了两个“谜”：一个谜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一般称为斯密的“价值之谜”，说的是钻石用处小而价格高，与水用处大而价格低的矛盾，这个谜的谜底被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学派给出，得到大家公认；另一个谜是斯密去世后的19世纪中叶，由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提出的，一般称为“斯密之谜”“斯密问题”“斯密难题”“斯密悖论”，说的是斯密两部著作即《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矛盾。这个谜的谜底，一百多年来众说纷纭，未有定论。本书关注的正是这一个未解之谜。

“斯密之谜”的几种解释

对于是不是存在“斯密之谜”，本身就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斯密之谜”是个伪命题，没有“谜面”，也就无从谈到“谜底”了。在认为确实存在“斯密之谜”的人中间，对于“谜面”到底是什么，也有不同意见。而谜面的确定（即两个不同的斯密，如何表述，如何概括，如何比较），直接关系到谜底的探究和揭晓。

有人说，矛盾在于《道德情操论》中把人的行为归结于同情，与《国富论》中把人的行为归结于自私。《道德情操论》表明，斯密在伦理学上是利他主义者，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而《国富论》则表明，斯密在经济学上是利己主义者，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是利己心。也有人说，《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其实是同一个经济学的“上、下册”。《道德

① 傅红春：经济学对“幸福”的离弃与回归——“斯密之谜”的一种解释，刊于《光明日报》2007年6月12日第10版理论周刊。

情操论》是经济学的“感性学分册”，《国富论》是经济学的“理性学分册”。有人认为，“斯密之谜”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冲突问题。这种冲突，17世纪中叶的霍布斯提出过，与斯密同时代但比斯密成名早的休谟提出过，休谟和斯密之后的康德提出过，现代的帕森斯和哈贝马斯也提出过。

笔者认为，《道德情操论》的斯密和《国富论》的斯密并非截然相反、针锋相对、不可调和，因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斯密长时间地、交叉地、多次打磨而成。《道德情操论》初版于1759年问世，1790年的第6版是定型版；《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出版，1786年的第4版是定型版。不管有意无意，斯密的思想不可能是断裂的、游离的。

说《道德情操论》的斯密和《国富论》的斯密完全是一回事，没有一点差别，也说不过去。那么差别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前面列出的几个“谜面”都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还有一个“谜面”，那就是《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增长”，而《道德情操论》的主题则是“欲望约束”。

“斯密之谜”的谜面与谜底

认为《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增长”，应该不会有什么疑义，但认为《道德情操论》的主题是“欲望约束”，明确提及的人不多。如果细读此书，会找到许多证据，限于篇幅，只引一段：“称为节制的美德存在于对那些肉体欲望的控制之中。把这些欲望约束在健康和财产所规定的范围内，是审慎的职责。但是把它们限制在情理、礼貌、体贴和谦虚所需要的界限内，却是节制的功能。”《道德情操论》论及的“道德情操”，在斯密时代，就是用于说明具有自私本能的人，为什么又不可思议地会具有克制这种自私本能的能力。

简单地说，笔者给出的“谜面”，是“财富增长”和“欲望约束”（两者看似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那“谜底”呢？就是幸福，或者说是“幸福最大化”。

“幸福=效用/欲望”的公式，是萨缪尔森给出的，但这个公式体现的思想内涵，在斯密那里是存在的。《国富论》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使“财富”（更现代的表述就是“效用”）更快更大地增长；《道德情操论》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使“欲望”在道德规范约束下不至于恶性膨胀（这和许多宗教所推崇的“无欲”是有区别的）。

为什么会有“斯密之谜”

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斯密那里，分述财富增长（《国富论》）和欲望约束（《道德情操论》），对于“幸福最大化”而言，思想上、逻辑上和操作上都是一致的，为什么后来会演变成一个世界性“难题”——“斯密之谜”了呢？

这是因为，斯密之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离弃了幸福。这种离弃，在凯恩斯（1883～1946）那里达到极致，至今还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于19世纪中叶提出“斯密之谜”之前，汤普逊（1775～1833）就非常明确并尖锐地指出了经济学对“幸福”的这种离弃。他在1822年完成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一书中写道：一切研究经济学的人，“都可以被分为两派——精神学派和机械学派。‘精神学派’宣称人只要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差不多不必凭借物质的从属作用，就能够得到幸福；‘机械学派’则正好采取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做出这样的安排，……尽可能多地生产……；另一方面，则是想出各种办法来找到足够的消费者使用生产出来的这些物品，……这一派学者所关心的，只是怎样达到最高额的生产和保证最大的消费或有效需求。”

汤普逊所划分的两派，前一派到后来基本上不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至少不是主流经济学家），而后一派则离“幸福”越来越远。最开始的离弃，也许只是研究方法的需要：一是因为幸福没有标准的统一的定义，很难定性，进而造成幸福很难定量；二是财富确实是增进幸福的重要手段。所以，在很多的经济学研究中，直接研究的就是既容易定性又容易定量的财富。

对“效用”的研究，逆转了经济学发展离弃幸福的趋势，是难得的对幸福的回归。讲“效用”比讲“财富”更靠近幸福，但这种回归并不彻底，也不成功，因为效用也很难计量。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经济学家的内心是否还记得“财富增长可以带来幸福增长”的假定，经济学的发展，表现出对幸福越来越漠视和疏远。西尼尔（1790～1864）明确说：“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我所要研究的不是幸福而是财富；我不但有理由省略，而且也许必须省略掉一切与财富无关的考虑。”到了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奠基人的马歇尔（1842～1924），

幸福经济学选读

财富也好，效用也好，进一步被规定为必须由货币来表示，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使个人的货币收入最大化（包含了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如果极端一点讲，凯恩斯关注的就是一个国家总体的货币收入（现代说法就是 GDP）。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也好，IS - LM 模型也好，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只要消费沦落为生产的附庸和工具，幸福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 GDP 崇拜症的根源。

就我国的情况看，在经济改革之前，有点汤普逊所批评的“精神学派”的倾向；而经济改革之后有一段时间，则有点汤普逊所批评的“机械学派”的倾向。事实证明，这两种倾向，都不是“幸福最大化”这个终极目标本身。

回归幸福：“两个斯密”合二为一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财富增长促进幸福增长”只是一个假定，而非一个绝对的普遍的真理。在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回归中，许多研究表明，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在这些经济学家中，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誉为“现代斯密”的阿玛蒂亚·森，是一个代表；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也是一个代表。但是另一方面，完全否定这个假定，认为财富增长一定不带来幸福增长，甚至是一定带来幸福的负增长，也是不对的。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在逻辑上并不能够推出幸福增长要求财富负增长（实证研究也不支持这种推论）。

回归幸福的经济学，也不否定已有的经济学的成就。幸福经济学作为分析和追求效率的科学，当我们记住成本和收益不只是以货币计量的所费和所得，其终极目标是“幸福最大化”时，仍然是非常有用的。

本书使用指南

一级标题是所选经典著作的书名，按著作初版时间先后排序（同一学者多部著作再以时间先后排在一起）。

二级标题是摘录内容的关键词句，以楷体标识。

在每部著作的摘录内容前，我们对每位学者的生平和学术成就，以及选本的内容梗概和版本信息，有一个简短介绍。

摘录内容都标注了原书页码，以方便读者查阅原著。

目 录

色诺芬《经济论 雅典收入》(公元前4世纪)	1
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30)	3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1697~1707)	6
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 私人的恶德, 公众的利益》(1714)	9
《休谟经济论文选》(1748~1758)	20
《魁奈〈经济表〉及著作选》(1757~1766)	23
《早期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 (古希腊~1760)	29
斯密《道德情操论》(1759)	33
斯密《国富论》(1776)	79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1789)	88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798)	102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	122
《圣西门选集》(1802~1825)	128
《傅立叶选集》(1803~1830)	139
《欧文选集》(1812~1820)	157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	218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二卷)(1820)	222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	225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1838)	242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要义》(1821)	266
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	269
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	302
格雷《人类幸福论》(1825)	308
格雷文集(1830~1840)	317

幸福经济学选读

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	328
理查德·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1831)	341
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1836)	344
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	348
约翰·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1839)	350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1844)	367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	376
巴斯夏《和谐经济论》(1850)	387
戈森《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1854)	400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	405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	412
乔治《进步与贫困》(1879)	416
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1884)	419
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1889)	42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	425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1899)	439
后记	443

色诺芬《经济论 雅典收入》 (公元前4世纪)

色诺芬(约前430~前355),苏格拉底弟子,古希腊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其著述涉哲学、历史、政治和经济各领域,代表作有《希腊史》《居鲁士的教育》《居鲁士远征记》《苏格拉底言行录》《斯巴达政体论》《经济论》《雅典的收入》。本次选读的《经济论 雅典收入》是两部书的合集。《经济论》是古希腊流传下来、现在世界公认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用记录苏格拉底和别人对话的形式讲述管理庄园的经验。《雅典的收入》论述雅典不依靠加重盟邦负担而自谋增加收入的方法。可以说,两书是最早论述幸福经济学思想的著作。

色诺芬·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张伯健,陆大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妻子对于家庭幸福的贡献和丈夫是完全一样的

最要紧的是研究。我要把阿斯帕西亚介绍给你,她比我知道得多,会给你解释全部问题。我认为妻子如果在家庭中是一个好配偶,她对于家庭幸福的贡献和她丈夫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收入大部分是丈夫勤劳的结果,而支出则大半是由妻子管理的。如果两个人各尽自己的本份,财产就增加了;如果她们做得不好,财产就要减少。要是你想学别种学问,我想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人,他们对于这些学问的任何一种都是很高明的。^①

① 12

幸福是你自己换来的；农业是一种享乐

“我还要补充一句：赖山德尔自己说，他听了这句话以后，便用以下的话来祝贺居鲁士：‘我觉得你应该享受你的幸福，因为这种幸福是你自己的力量挣来的。’”苏格拉底继续说：“我告诉你这些话，是因为最富足的人也不能离开农业。因为从事农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乐，也是一个自由民所能做的增加财产和锻炼身段的手段。……对于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因为这种职业似乎最容易学，而且从事这一职业也最为愉快，它能最大限度地使身体健美，它能给心力留出最多的空闲时间去照管朋友和城市的事情。而且，由于庄稼在城外生长，农场的牲畜也在城外放牧，我们觉得农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勇敢刚毅。所以这种谋生方法似乎应该受到我们国家的最大重视，因为它可以锻炼出最好的公民和最忠实于社会的人。”^①

将来共享的幸福之一，就是在老年能够得到最好的帮手和最好的赡养

现在，如果神赐予我们儿女，我们就要想出最好的教育他们的办法。因为我们将来共享的幸福之一，就是在老年能够得到最好的帮手和最好的赡养；但是目前我们先来共同享有我们这个家庭。^②

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幸福

你可知道，虽然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幸福，可是还有许多人怕麻烦，不去找他们所想要得到的好东西？^③

① 16

② 23

③ 41

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30）

托马斯·孟（1571～1641），出身于伦敦一个商人家庭，很小便从商，并因此赢得金钱和声誉。《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写于1630年前后，但直到1644年才由他儿子出版发行。现知该书有六个版本，由若干篇独立文章组成，最精辟阐述了重商主义原理，文章次序由他儿子排定。该书在很长时间，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托马斯·孟认为贸易与公众财富、国家实力和人民幸福有着密切联系。

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李琼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伟大而崇高的事业，……与公众财富、国家实力和人民幸福有着密切的联系

英国在印度的这些商品上所获得的财富，要大于那些出产和本来应该拥有它的国家与人民。因为这原本是他们国家的自然财富。但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把国家的利益和商人的利润区分清楚。虽然国家为胡椒所支付的价格并没有高于前面所说的价格，而且国家对其他任何来自国外的商品所支付的价格，也不会高于我们将它卖到外国时的价格，但是商人们所付出的就不仅是货物价款了，他们还需支付运费、保险费、关税以及货物遥远运输过程中的其他所有开销。但是从王国总账的角度看，这些不过是我国国内的账务往来，国家的财物并无任何损失。同时，我们还应该重视其他一些对我们有利的贸易，如与意大利、法兰西、土耳其及东方一些国家的贸易和航运就属于此类：靠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航海条件，我们每年都从东印度购进商品，然后再运到那些国家卖个好价钱。这是一项伟大而崇高的事业，它值得我们鼓起勇气并竭尽全力去保持和扩张。因为它与公

众财富、国家实力和人民幸福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勤奋努力增加生产本国产品从而致富相比，依靠其他国家的货物使自己富裕起来，并不是什么不光彩或不公正的事情，特别是当前者能增进后者的利益的时候，正如英国在与东印度的贸易中所发现的那样：由于锡、纺织品、铅和其他商品的销售的大量增加，在一些原来并不使用英国物品的国家现在的销售量也在日趋增长。^①

我们才是他们幸福的主要源泉

实际上，他们的船只不结实，不合作战，只适合于能给他们带来财富的渔业和贸易，或者成为他们的海上强敌的战利品，正像他们在丹刻克的一个贫穷的小镇上所发生的情形那样。尽管他们用了大笔的钱来进行作战准备，训练了士兵，造了战船，还有强大的护卫舰及其他值得肯定的准备措施，这些预防突发灾祸的准备工作他们从未中断过。可是如果他们遇到的是更为强大的海上敌人，迫使他们不得不增加一倍或两倍的开支的话，那我就非常怀疑他们能坚持多久，特别是当他们赖以生存的渔业受到（来自我们）阻碍时，他们要想设法生存下去，更是难上加难。再加上其他各种情况，我常常感到好奇，为什么荷兰人厚着脸皮吹牛的时候，会有那么多的英国人就信以为真了，竟然相信联合省就是我们的炮台、堡垒、城墙、外部工事和其他我说不出来的东西，似乎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在西班牙军队面前坚持多久似的。其实我们才是他们幸福的主要源泉，为了战争与和平，为了贸易与财富，为了军队与人民，我们流了鲜血才保护了他们；而他们自己的人民却因此可以去占领美洲新大陆，并且还从我们的手里收获了丰盛的贸易果实。这种贸易，如果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有权利和实力去这么做），它可以使英国的人口数量得以增加。因为我们有了这一维持人民生活的上佳的致富途径，使我们可以更好地抵抗哪怕是最强大的敌人，同时还可以使很多因为没有更好的生计而不得不到我们这里来的尼德兰人得以生存。如果果真如此的话，我们许多已经荒废了的海港城镇和城堡，就会马上重新修建起来；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生活，将会比以前最好的时候还要好。如果这些力量因此

^① 15

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30)

而团结起来了，这些城镇和城堡将会准备得更充分、更有把握和更具有生机与活力，而不是各自分封割据，互相拖延推诿，并且彼此互相猜疑。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不仅不应该忽略，而且还应该完全认识到其中的利弊，在必要的时候运用我们的力量（实施干预）。^①

^① 120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1697 ~ 1707）

布阿吉尔贝尔（1646 ~ 1714），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重农学派先驱。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法国经济严重衰败的时期。布阿吉尔贝尔任法官时，对农村经济衰落和农民贫困有较多了解，深切同情农民境遇，著述有《法兰西的详情》《谷物论》《货币缺乏的原因》《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这些著作写于1697 ~ 1707年。他反对货币是唯一财富的重商主义观点，与对外贸易是财富源泉的观点相反，主张农业才是创造财富的最重要源泉；认为法国200多个行业组成一个财富链条，其中农业是基础，各行业保持一定比例，各种产品主要以小麦等农产品为依据按比例进行交换，如农业遭到破坏，整个经济就将崩溃。重商主义追求货币，损害了农业，造成法国经济衰败。强调人们只能按自然规律办事，重商主义人为干预经济，违反客观规律，必然给法国带来灾难。他是自由竞争的早期拥护者，他的经济自由思想和重视农业的观点为后来的重农学派所继承和发展。他认为将金银当做财富和幸福生活的唯一源泉是一个严重错误的学说。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伍纯武，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将金银当做财富和幸福生活的唯一的源泉是一个严重错误的学说

我们认为，将金银当做财富和幸福生活的唯一的源泉是一个严重错误的学说，是不是还需要找出更多的例子来证实呢？^①

人们的幸福与不幸，只是按照他们狂热地追求的贵金属拥有多寡来决定

① 133

这种情况不就是一个普遍的富裕吗？这就是说，无须运用哪怕是少量的金钱，即有大量财物的消费和惊人的享受。这样，那些挥金主义的说教者的猜想，未免差得太远了，他们将金银奉为监护生活的神，认为人们的幸福与不幸，只是按照他们狂热地追求的贵金属拥有多寡来决定。^①

为了保持幸福的境界，就必须使一切事物、一切商品，继续不断地处于平衡状态

我们曾经说过，并且还要说，为了保持幸福的境界，就必须使一切事物、一切商品，继续不断地处于平衡状态，并保持一个在商品之间的、按照一定比例的价格，以及使这个价格能偿付生产商品的费用。可是，我们知道，像在一个天平上的平衡关系那样，当一端增加了虽然是极少的重量，却立刻就会使另一端升高上去，好像里面没有东西似的。^②

由于心灵可怕地堕落，尽管本应通过维护这种和谐来期待自己的幸福，但却没有一个人不是从早到晚处心积虑并竭尽全力来破坏它

整个财富是按比例产生的，因为只有靠比例的办法才有交换，从而使贸易得以进行：两顿一样精美的饮食，却因为一顿很贵，另一顿便宜得多，便以不同态度对待，硬把花钱多的饭说成会给人更高度的幸福，这是很可笑的。……因为这种存在于两个纯粹只是彼此贸易的商人之间的公平关系，如今必须扩大到法国今天所拥有的两百多种行业，而这些行业由于只有靠着这种公平关系才得以存在与维持下去，故维护这种关系对他们全都有彼此息息相关的利益，因此这种关系不应受到任何破坏，也就是说，最贫苦的工人不应亏本地出售，否则，他的破产会像病毒一样传染整个团体。这一点必须不仅仅在个人与个人之间，而且也在地方与地方、省份与省份、王国与王国，乃至于一与那一年之间进行，互相帮助，彼此提供自己多余的东西，以换回缺少之物。但是由于心灵可怕地堕落，尽管本应通过维护这种和谐来期待自己的幸福，但却没有一个人不是从早到晚处心积虑并竭尽全力来破坏它。没有一个工人不竭力企图将其商品以三倍于其价值的价钱出售，而以成

① 135

② 156

幸福经济学选读

本价值三分之一的价钱得到其邻人的商品。只是靠着刀尖的力量，才得以在这些情况下维持着公道，然而这却正是自然或神明所曾负责处理之事。而正像自然或神明给弱小的动物准备了隐蔽所和护身术以便不至于全部都成为强大有力而且生来便有坚齿利爪、靠食肉为生的动物的猎获物那样，在现实社会的贸易中，自然或神明建立了这样的一种秩序，只要听任自然安排，强者在购买穷人的东西时就无法阻止这种出售会给穷人提供生计；这便维持了富足，而他们各自符合其身份的生活是靠着这种富足才得以获得的。我们说过，只要听任自然安排，这就是听其自然，任何人参与这种贸易只是为了在贸易中给所有人以保护而阻止发生暴力行为。然而，人们却与此背道而驰；无论什么手段，不管多么骇人听闻，人们都认为不仅完全合法，而且甚至誉之为破坏这种和谐的最巧妙的政策，他们通过拥护者，向所有的食品逐一进攻或者大加摧残。^①

^① 295